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回顾与展望

□ 何自力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为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也随之形成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经济恢复和发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党面临的重要任务。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如,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互助组、初级社、人民公社等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在此指导下,我们党在城市成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得以形成和巩固,为经济建设全面开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如,关于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论断;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综合平衡的论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论断;等等。这是我们党从实际出发探索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初步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此指导下,我们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于国家最急需的部门,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推动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比如,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方面,认识到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在所有制方面,提出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制度方面,认识到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但要发挥按劳分配对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重要作用,还要发挥按要素贡献分配对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资本、管理、土地等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激励作用,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经济体制方面,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成果,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指导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总结实践、展望未来,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我们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行动指南,对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特色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果,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指导下取得的。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经验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提供了丰厚的土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既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其一,紧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党排除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干扰和影响,从中国实际出发,着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性,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实现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体制安排的新特点,为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提供重要理论指导。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这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有助于经济学更好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其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方法论。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新问题新情况,提出了许多具有鲜明辩证法色彩的经济理论,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用好“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结合;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等等。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其三,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理论研究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亿万人民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也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伟大事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根植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把人民群众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创造的丰富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通过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对经济学的真理性进行检验,才能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四,坚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中,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所有制问题研究。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作为逻辑起点是科学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实际,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建国初期,我们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为随后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探索并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其五,坚持以揭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性作为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逻辑过程与历史过程相统一是经济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根本原则。科学的经济学命题和观点不是来自人的主观想象,不在于有多么精妙的表达形式,而在于是否反映客观的社会经济实践,反映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性。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经济学灵丹妙药,脱离实际、缺乏历史感的经济学没有生命力。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紧紧扣住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实践,把揭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性作为重要任务,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接地气,符合中国实际,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新任务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指导。

第一,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发展新历史方位的内涵和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研究新历史方位的深刻内涵,探索新时代经济发展规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理论指导。

第二,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及其对社会生产目的的新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着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性,为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优化经济结构,更充分满足人民在经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提供理论指导。

第三,深入研究新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迁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人类社会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产业变迁的发展阶段,正在进入新一轮以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等为特征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期。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和数字产业发展的规律性,为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第四,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善。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实现形式的研究,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供理论指导。

第五,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所处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眼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面临全新的外部环境。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深刻认识这一“变局”的丰富内涵,揭示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指导。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理论动态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新时代改革发展

全球科创中心发展的新动向及其启示

□ 江 鸿

理论在线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正在加速推进。考察全球重要科创中心发展的最新动向,吸收借鉴先进建设经验,对国内各地科创中心顺应全球发展趋势、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

目前全球重要科创中心发展出现不少新动向:

其一,打造产业多元化、布局均衡化的格局。近年来,全球重要科创中心的产业构成大多发生了渐进性转变,从单一产业支撑转向多元产业支撑;产业的空间布局亦随之发生渐进性扩散,从单一集聚核心转向多点集聚。布局使这些科创中心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弹性,较快实现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恢复和科技发展。

在支柱产业多元化发展方面,硅谷、波士顿、慕尼黑等城市的表现在非常突出。在硅谷地区,生命科学产业已经超过移动通信、软件开发、计算机硬件与服务、电子等与信息技术紧密相关的产业部门,成为仅次于互联网产业的第二大产业。在波士顿地区,生物科技产业的兴起和创新区的多次再造,已经完全改变了波士顿早期以电子产品产业为主的创新经济格局,以及此前以垂直一体化大型企业为主的单一发展模式。

在产业空间布局均衡化发展方面,慕尼黑等地的做法颇有特色。以慕尼黑为例,当城市扩张推动地价上涨、迫使传统工业迁离市区之初,慕尼黑市政府即十分注重扶持传统产业。一方面,在兴建科技工业园区的同时,于园区中划出专供传统产业租用的用地面积,并扶持园区中的传统工业企业向市场供货。另一方面,坚持实施产业中心政

策,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为传统产业创造经营空间。

其二,推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的大背景下,科技积淀雄厚的发达国家科创中心很少“全面开花”地进入各个新兴技术领域,而是注重“重点突破、优势强化”,在新兴产业的技术发展方向与本地传统优势产业的新兴需求之间建立联系。新兴产业围绕本地需求选择聚焦领域,形成独特优势;传统产业的技术需求得到满足,原有优势进一步夯实。

以伦敦为例,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这些年,新创企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表现最为突出。这是数字技术创新和传统金融产业优势融合的结果。2008年到2018年,伦敦48%左右的创业企业和创投资金都进入了这一领域。此外,伦敦的新创高技术企业数、新创企业接受投资交易次数、新创企业接受投资总额等都仅次于硅谷,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传统优势。

此外,慕尼黑ICT产业的优势培育方式也体现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与融合。ICT产业是慕尼黑新兴的支柱产业之一,其不仅与本地的垂直应用产业紧密协同,而且多数采取聚焦战略,选择特定的垂直领域深耕,既避免了激烈的本地竞争,又为扩大规模、全球经营奠定了差异化的能力基础,进而对欧洲乃至全球的细分市场上取得了领先优势。

其三,重视人才需求,建设产住并重的“创新街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全球科创中心普遍面临着吸引新兴科技产业人才、推动本地产业转型的要求。打造创新发展与社区居民生活并重的“创新街区”,正在成为发达国家科创中心转型的重要方式。

“创新街区”不同于以产业空间为核心的创新产业开发区,而是产业空间与居住空间自然交织、富有街区活力与人文特色的“城市型”创新区域。美国波士顿、亚特兰大、纽约、芝加哥、西雅图等众多城市都在积极打造创

新街区。比如,波士顿东部海港创新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创新街区新建范例。波士顿市政府通过促进合作,创建紧密的生态系统,提供公共空间,建立丰富的开放空间和场地,创造多样化的办公空间,营造活跃的“24小时”社区,提供居住工作空间等一系列举措,打造了一个极具活力的“创新街区”。

(二)

总的来看,这些全球科创中心发展的新动向,对我国发展有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第一,要推动产业结构和人才结构多元化发展。产业结构和社区人口的两极分化是全球顶级科创中心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面临的共同挑战。推动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要点之一,在于打造产业结构、人才结构多元而均衡的综合体。

一方面,在发展新兴高技术企业的同时,应注重为制造业、传统产业的发展创造空间。对此,我国科创中心建设可从两点入手,在城市地带保持合理的制造业和传统产业比例,为产业融合以及对制造业应用、改进有现实需求的创新研发提供产业基础。

一是可参考日本等国做法,在成本不断提高、制造业外迁的大背景下,选择性地保留甚至新建资源集约的“母工厂”,将“制造资产”转化为持续改善先进制造技术和现场管理方法的“研发资产”,发挥“母工厂”在技术支持、开发试制等方面的作用,化解制造业创新发展中与城市集约化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是可参考慕尼黑等地的做法,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为传统产业打造“产业中心”,为创意手工业、传统工业、批发业等保留经营空间。

另一方面,在吸引全球高端创新人才集聚的同时,保持合理比例的中端技术人口,确保就业结构和人才结构支持本地产业链可持续发展。我国科创中心要在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力,不仅需要持续吸引全球顶尖科研人才,而且需要大幅提高本地现有劳动力的生产率和技术水平。为此,需要切实加强面向大众的职业培训和技能培训,增加更多居民的就业机会。

第二,要提高创新链条和产业链条的本地化水平。在新兴的科技领域内,全球各大科创中心都注重发掘本地和周边城市群中垂直需求旺盛的应用部门,如何通过“重点突破”推动传统产业优势和新兴技术优势融合?关键在于提高创新链条和产业链条的本地化水平。

首先,可借鉴国际经验,通过产权纽带,协助产业建立起紧密型的研发网络。比如,德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往往与研发力量强、产业地位高的某个大型企业共同发起产业网络合作,且以产权纽带或出资关系维系紧密型组织,确保政府政策能够通过网络合作组织切实落地实施。其次,充分利用新城建设,打造新兴技术产业化的测试平台,加快新兴技术的改进与应用速度。在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与垂直行业的紧密融合,在测试与试用中发现问题,获得改进机会。慕尼黑、伦敦、硅谷等地都在积极为垂直应用产业提供测试平台。

第三,科创发展思路要从“园区”向“街区”转变。要转变以产业集聚先行的“园区型”发展思路,落实以科创人才生活体验为先、以人才集聚带动产业繁荣的“街区型”科创发展新思路。“创新街区”重在产业空间和居住空间、公共空间、创新空间的自然交织,有助于在小尺度城市空间的微观层面将产业融合落到实处。

我国可参考国内外科创中心的先行范例,对公共空间和创新空间的建设和运营进行相关调整。比如,可考虑借助PPP模式,建设以公共创新中心为代表的办公型公共空间;建设紧密关联的社交型公共空间,发挥其对集聚人气、促进沟通和激发创新活力的催化作用,促进街区功能混合;等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